

跨文化语用视角下《雷雨》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研究

罗 梅

贵州财经大学外语学院, 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3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2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9日

摘 要

文化负载词本质上是特定文化体系通过语言外显出来的符号化凝结, 映射出各文化群体在认知模式与心理结构上的固有差异。这些词汇不仅承担指称功能, 更附着了丰富的语用维度——譬如言外行为、礼貌调节、情感传达及面子协商等。译者倘若仅仅依赖词典释义进行字面对译, 其隐含的交际意图极易丢失; 更妥当的处置方式, 是依据具体语境还原其语用效力。而这一点, 恰恰构成了翻译操作中最难攻克的一关。文章以王佐良与巴恩斯合译的《雷雨》英译本为研究对象, 从跨文化语用视角出发, 聚焦于该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处理, 系统梳理其具体翻译策略, 并尝试揭示各策略选择背后的依据。研究发现, 译者在处理源语文本文化负载词时, 能够准确辨别其中的话语行为、会话含意以及面子威胁程度, 灵活运用异化、归化或意译等不同手段, 对目的语中的交际效果进行重塑或修正, 最终有效达成跨文化语境下的意义传递。

关键词

文化负载词, 跨文化语用视角, 翻译策略, 典籍英译

A Study on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Culture-Loaded Words in *Thunderstorm* from a Cross-Cultural Pragmatic Perspective

Mei Lu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August 31,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26, 2026; published: October 9, 2026

Abstract

Culture-loaded words are, in essence, symbolic condensations manifested through language within a specific cultural system, reflecting the inherent differences in cognitive models and psychological structures among various cultural groups. These words not only fulfill a referential function but also carry rich pragmatic dimensions—such as illocutionary acts, politeness modulation, emotional conveyance, and face negotiation. If translators rely solely on dictionary definitions for literal translation, the implicit communicative intentions are highly likely to be lost. A more appropriate approach is to restore their pragmatic effect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context. This very challenge constitutes the most difficult hurdle to overcome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This paper take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understorm* co-translated by Wang Zuoliang and Barnes as its research object. From a cross-cultural pragmatic perspective, it focuses on the translation treatment of Culture-loaded words in this version, systematically categorizes the specific translation strategies employed, and attempts to reveal the rationales behind each strategic choice. The study finds that in dealing with Culture-loaded words in the source text, the translators were able to accurately identify speech acts,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s, and the degree of face threat, flexibly employing various methods such as foreignization, domestication, or free translation to reshape or adjust communicative effects in the target language, ultimately achieving effective meaning transmission in cross-cultural contexts.

Keywords

Culture-Loaded Word, Cross-Cultural Pragmatic Perspective, Translation Strategy,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文化负载词被视作特定文化现象借助语言形式所做出的外在映射，其揭示的是不同群体在思维方式与群体性格方面的明显差异。这类语汇是民族语言体系中的核心组成要素，也为该民族文化底蕴的直观外显。翻译行为一旦在异语之间展开，文化空缺的情形便很容易出现，译者因而常常无法在目的语中寻得语义层面完全对等的既有表达[1]。此类词语所承载的社会文化信息极为丰厚，其翻译是否精确、得体，直接左右着文化传递的实际成效，因而构成了翻译实践中最令人棘手的问题之一。

文化负载词(亦称文化特异性词汇)的概念最早由西班牙翻译家哈维尔·弗朗哥·艾克塞尔德提出。他注意到，由于译文读者所处文化体系的差异，源语言文本中的某些词汇难以将其功能和含义准确传递到目标语言中。他认为，文化特异性词汇不仅取决于词汇本身，更取决于目标语言读者能否接受这些词汇[2]。在国内学术界，“文化负载词”这一概念最早由徐国章于1988年在其论文《文化负载词与英语教学》中用英文提出。在词典学与翻译学领域，文化负载词(也称文化特有词或文化限制词)通常被界定为“与特定语言共同体生活方式紧密相关的词语或短语”[3]。近些年来，围绕文化负载词英译的研究日趋活跃，所涉理论视角不断扩展，文本类型也日趋多元。部分学者借助文献计量工具对已有成果进行分类统计后发现，2019年之后，该领域受到的关注度显著提升，论文产出数量增长尤为明显[4][5]。

全球化不断深化，不同文化之间愈加紧密互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也随之逐渐超越了语言学领域的

固有疆界，逐步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等多元层面。中国拥有悠远的历史文脉与丰厚的文学遗产，推进典籍英译工作，既是强化文化自信的实际路径，也是向外传递中华文化精神的关键通道。国际交往日趋紧密，使得文化负载词的精准翻译构成了跨文化沟通的基础性前提；人们对文化多样性的领悟逐步加深，尊重并包容文化差异已逐步成为日常交往中的基本素养。在教育国际化步伐加快的背景下，师生群体需要面对日益多元的文化资源，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品质因而对于教学实践与学术探索产生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传统的翻译理论虽然强调译文的功能和目的，但在语言实际运用中的微观语用动因方面着墨不多。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实质上是跨文化言语行为的再现过程，译者无法回避其中蕴藏的语用要素。本文拟从跨文化语用视角出发，检视王佐良与巴恩斯在《雷雨》英译本中处理该类词汇的做法，力图阐明译者在目标语中如何再现源语的语用指向，进而为文学翻译提供一条语用学导向的实践路径。

2. 跨文化语用视角与文化负载词

2.1. 国内外《雷雨》翻译研究综述

近十年，随着中国文学外译研究持续升温，《雷雨》英译研究逐渐增多，但整体上仍以王佐良与巴恩斯合译本为主要考察对象。已有研究大致沿三条路径展开：其一，从戏剧翻译的可表演性出发，讨论台词节奏、口语化程度、人物性格再现及舞台演出效果；其二，从目的论、功能对等、交际翻译等理论切入，分析称谓、成语、文化负载词及修辞格的翻译；其三，从文化外译与接受角度，考察译本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副文本及读者接受。就文化负载词而言，已有成果多集中归类归化、异化、直译、意译等策略，或讨论某一类文化词(如称谓、民俗、宗教词)的处理方式。然而，这些研究多停留在策略标签和宏观理论层面，较少深入分析文化负载词在具体戏剧对白中所执行的言外行为、面子威胁和会话含意。换言之，已有研究对“为什么在此语境中必须选择此策略”的语用动因解释不足。

2.2. 语用翻译研究综述

自 Hatim 和 Mason (1990)将合作原则、言语行为、礼貌原则及跨文化交际纳入翻译研究后，语用翻译逐渐成为翻译学的重要路径。国内张新红、何自然(2001) [6]较早系统讨论了语用学理论在翻译中的应用；方荣杰、李雯(2023) [7]与许悦萌、刘永杰(2021) [8]的文献计量与述评显示，国内语用翻译研究数量持续增长，理论视角不断扩展。但总体来看，现有语用翻译研究多集中于公示语、旅游文本、广告、字幕、新闻等应用型文本[9]，对戏剧经典中文化负载词的跨文化语用研究仍显不足。戏剧对白兼具文学性、口头性与表演性，其文化负载词往往同时承担指称、表情、指令及面子调节等多重功能，若仅从语义对等或归化/异化角度分析，难以充分解释译者的实际选择。

2.3. 研究不足与本文定位

综合来看，已有研究存在三方面不足：第一，《雷雨》英译研究多从目的论、功能对等或戏剧翻译宏观原则切入，对文化负载词在具体交际情境中的语用机制关注不够；第二，语用翻译研究虽成果丰富，但较少以戏剧经典为语料，尤其缺少对“面子威胁-人物关系-戏剧张力”之间互动关系的系统考察；第三，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研究常停留于“归化/异化”二元归类，未能充分回答策略选择背后的语用依据。

因此，本文的学术贡献并非简单填补空白，而是对既有“归化/异化”二元框架作出补充与挑战：本文以王佐良与巴恩斯合译的《雷雨》英译本为研究对象，从跨文化语用视角出发，将言外行为、礼貌与面子、会话含意纳入文化负载词翻译分析，提出“以语用效果为依据的动态选择观”。即：译者在处理文

化负载词时，不应机械坚持某一策略，而应在人物性格一致性、台词戏剧张力与目标语观众理解之间进行语用平衡。

3. 跨文化语用视角下《雷雨》文化负载词翻译案例分析

例 1:

柜前有一张小矮凳，左角摆一张长沙发，上面放着三四个缎制的厚垫子。沙发前的矮几上放着烟具等物，台中偏右两个小沙发同圆桌，桌上放着吕宋烟盒和扇子[10]²。

The left hand corner is occupied by a sofa with several plump, satin-covered cushions on it, in front of this stands a low table with a cigarette box and ash-trays on it. In the center of the stage and slightly to the right are two small sofas with a round table between them, and on this table are a cigar box and a fan ([10], p. 3).

“矮几”和“吕宋烟盒”在原文中不仅是舞台道具的名称，更执行了指示性言外行为——向读者、观众暗示这是一户富裕人家的居所，体现阶级地位。在王佐良和巴恩斯的译本中，他们采用了归化翻译策略，将“矮几”译为 low table，将“吕宋烟”译为 cigar-box。作为经典的家居用品，直译“矮几”可能会让英语读者感到困惑，因此将其译为一种可用作座位的多功能平台，是一种更容易接受和理解的说法。“吕宋烟”一词在中文语境中暗含着某种社会阶层方面的身份标记，但对于英语读者来说，对这一名称并不了解。为了消除语言层面及文化背景所造成的理解障碍，王佐良与巴恩斯将其转译为“cigar-box”。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源语所独有的文化意蕴，但其根本意图在于确保信息交流的顺畅进行，同时兼顾译文的可理解程度，致力于在两种语言系统之间搭建一种尽可能贴近的对应关系。

例 2:

她的命很苦([10], p. 154)。

Times are hard for her now ([10], p. 155).

“命苦”意味着生活不如意，诸事不顺，总是充满坎坷；也隐含说话者的同情、怜悯以及对命运不公的感慨——这是一种表达性言语行为。

针对“命苦”一词，译者将其处理为“Times are hard for her now”这一英文表述，此译法较为精准地传达出该词的核心语义内容，揭示了鲁侍萍经济上的困顿状态及其所面对的多方面生活压力。对于英语受众而言，这一表达有助于他们迅速体会其处境之艰难。此外，“Times are hard”这一用语在流露出作者对鲁侍萍不幸命运的悲悯情怀之余，也能够读者一端唤起类似的情绪感应，进而促使其对戏剧情境及人物的悲剧走向获得更加深入的理解。

例 3:

我听说我在外边的时候，你这两年来在家里很不规矩([10], p. 90)。

I hear your private life's been highly irregular while I've been away these last two years ([10], p. 91).

此处“不规矩”系周朴园指向周萍的一句批评性话语，在剧本语境中，这种措辞构成了一种较为突出的面子威胁行为。周朴园使用了“不规矩”这个相对斯文的表达，而非选用更加粗俗的责骂用语，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冒犯的程度。王佐良和巴恩斯将其转译为“irregular”，该词在英语世界中同样兼具正式感与书面语色彩的否定评价，因此在译作中保持了大致相近的面子威胁强度。这一译法突出了剧中人物之间的阶层落差与权力不对等，保证了原文与译文在文化背景和语言风格上的一致性，便于读者或观众理清人物关系和情节演变，并在译文中体会到周朴园的失落与恼怒，从而加深对叙事进程的理解。

例 4:

鲁侍萍: 糊涂东西, 你还不跑([10], p. 252)?

鲁大海: 你好糊涂([10], p. 254)!

鲁侍萍: 你别糊涂啊([10], p. 254)!

Ma: Run, you fool ([10], p. 253)!

Hai: What an idiotic thing to do ([10], p. 255)!

Ma: You mustn't do it ([10], p. 255)!

在这个场景中, 出现了三次“糊涂”, 但每一处的含义都不同, 意蕴深远, 内涵丰富。因此, 王佐良采用了意译的方法。鲁侍萍说周萍是“糊涂东西”, 意思是他不知道四凤是他同母异父的妹妹, 却爱上了她, 又无法公开承认, 因此深感痛苦, 所以称他为糊涂东西。鲁大海责备母亲“糊涂”, 让她放走周萍, 认为这是愚蠢的行为, 但又只能含蓄地批评母亲。第三处“你别糊涂啊”则为母亲悲痛的呼喊, 透露出鲁侍萍担心四凤因羞耻而自寻短见的深切忧虑。可见, 三处“糊涂”虽词面相同, 所指却各有分别。王佐良与巴恩斯分别将其译为“fool”、“idiotic”及“You mustn't do it”, 较为恰切地区分了该词在不同语境中的内涵, 其中“fool”与“idiotic”作为英语中的近义表达, 亦与源语中“糊涂”的反复出现形成了对应。“You mustn't do it”没有说明四凤将要做何事, 留待观众去解读和品味。如同原文一样, 只有结合上下文才能理解四凤可能企图自杀的可能性。这种翻译实现了含蓄而深刻的意蕴表达。

王佐良与巴恩斯没有拘泥于形式上的对等, 而是将重点放在了情绪力度、语用功能和社会文化意义的传递上, 力求让译文在目标语中收到与原文相当的效果。译者根据不同的语境, 有选择地采用情感上匹配的英语词汇和句式, 摒弃了机械保留字面意义的做法, 在确保译文可接受的同时, 守住了原文的交际效果。

例 5:

她是个下等人, 不很守本分的。听说她跟那时周公馆的少爷有点不清白, 生了两个儿子([10], p. 152)。

She was a low-class girl who'd been getting above herself. It seems she'd been having an affair with a gentleman's son by the name of Zhou, and that she'd had two sons by him ([10], p. 153).

“不守本分”与“不清白”, 都是对鲁侍萍个人品格方面的贬低。周朴园在这里采用了一种较为迂回的批评方式——借助“有点不清白”、“不很守本分”这类含混程度较高的措辞来取代直接的斥责, 用不确定性为接受者留出了自主解读和作出反应的余地。

王佐良与巴恩斯在此处选择了“Been getting above herself”这一表述方式, 暗含着对个体所作所为的否定判断, 因为这个短语显示出一种自我评价偏高、逾越自身应有界限的状态。这一译法不但保留了原句表层的语义信息, 而且清晰地揭示出鲁侍萍的行为被视为“不守本分”、不符合当时社会普遍预期的实质。除此之外, “having an affair”直接点明了婚外恋情关系, 进一步明确了鲁侍萍与周家少爷之间往来的本质属性。这样的措辞安排, 有助于英语读者更加准确且方便地把握人物之间的关联, 同时也突出了其行为在道德层面上的争议特征, 与中文“不清白”的说法形成了较好的对应。

例 6:

车站的钟打了十下, 杏花巷的老少还沿着那白天蒸发着臭气, 只有半夜才从租界区域吹来一阵好凉风的水塘边上乘凉([10], p. 186)。

The station clock has struck ten, and the people of Amond Blossom Lane, old and young, are taking the air along the banks of a pond which, although it is the source of evil exhalations drawn up by the summer sun in the daytime, provides late

at night an open space where one may catch the fresh, cool breezes that blow in from the less crowded area of the foreign concession ([10], p. 187).

“杏花巷”是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一个地名，它在原文中的言外作用是激发汉语读者对传统里弄名称的诗意思象——杏花在中华文化里往往与春天、优美、文雅等意涵相连。王佐良与巴恩斯将其异化为“Amond Blossom Lane”，较好地保持了源语的文化信息。将“杏花”这个中国元素引入英语，一方面能够丰富英语的表达内容，另一方面也为英语读者提供了一次认识中国文化的机会。同时，在语义层面准确地传达了原词所指，保证了信息传递的准确性，运用异化策略有利于保全原文的文化特质和语言风貌，并在修辞层面尽量保持原文的风格。

4. 《雷雨》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对中国文学外译的启示

由于《雷雨》属于戏剧文体，它的体裁特征给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施加了双重压力：一方面，译者要尽力维持原作的情绪基调和人物性格；另一方面，还必须考虑舞台演出的实际要求，即台词的可说性和听觉效果。这种双重限制，使得该译本在文化负载词的处理上呈现出某种示范效应，同时也为中国文学外译提供了可参鉴的做法。

1) 超越字面对等，注重语用功能

在翻译文化负载词时，不能简单地以词典释义作为依据进行机械转换，而应该具体分析该词在特定交际场合中的语用指向。译者需要敏锐地体会词语在对话中携带的言外之意，在译入语中追求功能层面的对等，而不必勉强维持形式上的近似。

2) 体察面子策略，重构礼貌表达

中文文化负载词承载着丰富的含义，有时蕴含谦逊、客套、委婉拒绝等社交修辞。译者要敏锐辨识原文中面子威胁的层级与指向，进而审慎抉择。

3) 进行语用调适，实现跨文化沟通

译者要在保持原文精神的前提下，对表达方式、修辞手段甚至文化意象进行局部重构，以确保译文在异质文化中能够引发相近的情感共鸣与理解效果。

4) 以语用效果为依据，平衡异化与归化

异化与归化策略的选择，要根据具体语用效果的实现。若要保留源语文化特色，且不致造成理解障碍，则可适度异化；反之，如果文化差异可能阻碍意义的传递，则需借助归化手段。

《雷雨》的翻译经验告诉我们，文化负载词翻译的要害在于如何平衡“忠于文学性”和“照顾可演性”之间的关系。这对译者的素养提出了双向要求：既要拥有扎实的双语能力和文化敏感度，又要具备对剧场艺术的感知力。唯有如此，中国文学的外译才能不止于传播情节，而是进一步传递出作品背后丰富的文化纹理与人性深度。

5. 结论

本文以王佐良与巴恩斯合译的《雷雨》英译本为研究对象，从跨文化语用视角探讨了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案例分析表明，译者并未机械追求词典释义式的字面对等，而是根据文化负载词在具体交际情境中的语用功能，灵活采用归化、异化、意译等策略，在目标语中重构其言外行为、面子威胁和会话含意。

首先，对于指示性言外行为，如“矮几”、“吕宋烟盒”，译者采用归化策略，译为“low table”、“cigar box”，优先保证舞台指示的可理解性和英语读者的接受效果。其次，对于表达性言外行为，如“命苦”译为“Times are hard for her now”，传达了说话者的同情与命运不公之感。再次，对于面子威胁行

为,如周朴园指责周萍“不规矩”,译者选用“irregular 这”一正式且带书面语色彩的否定评价,既保留了周朴园的权威身份,又维持了原文的面子威胁强度;而“不守本分”、“不清白”译为“getting above herself”、“having an affair”,则通过委婉与明确相结合的方式,重构了原文的礼貌策略和道德评判。最后,对于“糊涂”的三次复现,译者分别译为“fool”、“idiotic”和“You mustn’t do it”,准确区分了批评、责备与警告/恳求等不同语用意图,保留了台词的含蓄美与戏剧张力;“杏花巷”译为“Amond Blossom Lane”,则通过异化策略保留了源语文化意象。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戏剧文体的特殊性使文化负载词翻译面临双重压力:一方面要维持人物性格的一致性,另一方面要确保台词可说、可听、可演,并保持戏剧张力。在处理不同类型的面子威胁行为时,译者的语用平衡尤为明显。以周朴园的命令与指责为例,其话语多带有家长权威和阶级优越感,译者因而采用正式、克制、书面化的表达,如 irregular, 避免过于粗俗或直白,以维持人物性格的统一。以鲁侍萍的请求与警告为例,如“你别糊涂啊!”译为“You mustn’t do it”,译者则采用情感化、留白和意译手段,既保留母亲对女儿的深切忧虑,又避免将潜在悲剧说得过于直露,从而维护了台词的戏剧张力与观众的解读空间。若将周朴园译得过于粗俗,会破坏其家长权威;若将鲁侍萍译得过于直白,则会削弱悲剧的含蓄力量。

由此可见,王佐良与巴恩斯在处理《雷雨》文化负载词时,实际上是在“忠于文学性”与“照顾可读性”、“保持人物性格”与“确保舞台效果”之间进行动态协商。其成功经验说明:文化负载词翻译的关键,不在于预先判定归化优于异化或异化优于归化,而在于以语用效果为依据,综合考虑言外行为、面子威胁、会话含意、人物关系及戏剧文体功能。因此,本文主张,戏剧经典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应建立“语用效果优先”的动态策略观,这既是对既有归化/异化二元框架的补充,也为中国文学外译提供了可操作的语用学路径。未来研究可结合观众接受实验、平行语料库和多译本比较,进一步检验这一语用平衡策略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 [1] 张焱. 汉英翻译过程中的难译现象处理[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 [2] 张碧涵. 巴金《憩园》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J]. 文教资料, 2019(12): 3-5.
- [3] Hartmann, R.R.K. and James, G. (2000) Dictionary of Lexicograph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4] 方娇娇, 吴婷婷. 汉语文化负载词英译研究综述[J].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4, 30(2): 139-140.
- [5] 陈曼, 陈利佳, 许玉鑫, 王佩圆. 国内近十年文化负载词相关研究文献综述[J]. 海外文摘, 2022(17): 22-24.
- [6] 张新红, 何自然. 语用翻译: 语用学理论在翻译中的应用[J]. 现代外语, 2001, 24(3): 285-293.
- [7] 方荣杰, 李雯. 国内语用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1988-2020)——基于 CNKI 的文献计量分析[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3, 45(1): 91-105.
- [8] 许悦萌, 刘永杰. 国内语用学翻译研究述评: 现状与趋势[J]. 长春师范大学学报, 2021, 40(9): 93-100.
- [9] Chen, S. (2010) A Study of C-E Translation of Public Signs in Scenic Spo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kopostheorie.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Nor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Changchun, 22-24 July 2010, 189-196.
- [10] 曹禺. 雷雨: 汉英对照[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01.